



3月19日,游客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参观。 新华社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欧洲：  
疫情中的“口罩歧视”

“疯了!简直疯了!我没妨碍到任何人,我自己的免疫力低下,戴口罩是为了自我防御。告诉你们,我去过三个疫区,你们觉得我戴口罩好还是不好?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我建议还是让我继续戴上口罩。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警惕,而不是由我来保护你们。”3月5日,在疫情已然大规模暴发的意大利,一名叫马特奥·达罗索的议员戴着口罩进入议会进行演讲,居然遭到了议员同僚们的嘲笑,议长最终听从大多数意见,要求达罗索“要么摘下口罩,要么离开”,愤怒至极的达罗索说出了上述言论。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日,意大利单日新增4207例,累计确诊35713例,已经是目前全世界疫情暴发最严重的区域,可即便如此,政府依然没有发布要求公民戴口罩的强制命令,意大利舆论也没有赞誉达罗索的“先知先觉”。

无独有偶,3月3日,在瑞士,一名女议员也因戴口罩被从议会中驱逐。这位名叫玛格达莱娜·马尔图的议员是首个戴着口罩进入瑞士议会的人,但她的举止随即引发了争论,议长毫不客气地对她下了逐客令,理由是“扰乱会议秩序”。

在欧洲,类似的口罩歧视,不仅发生在“庙堂之上”。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德国近期发生的首起事关新冠肺炎的诉讼就与口罩有关:德国著名机场免税店海涅曼的员工因不满雇主禁止他们在工作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将后者告上法庭。原来,在欧洲疫情恶化后,一些员工自行戴上口罩,但雇主担心带来紧张和恐慌,吓跑顾客,于是下达禁令:如果继续佩戴,我们将把您送回家!

事实上,不仅政客和民间对口罩有抵制情绪,连欧美的医疗机构对口罩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在疫情同样严重的法国,法

国卫生部下属的卫生总署署长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要勤洗手,戴口罩并没有用”。德国卫生部的表态是“普通民众戴口罩没有意义”,美国疾控中心则说“健康的人并不需要戴口罩”。在英国和法国,口罩干脆被列为了“处方药”,只有病人才有“资格”佩戴。这也就导致了戴口罩者被打上了“病人”的标签,走在大街上都要受到歧视,以至于很多华侨华人在欧洲反而需要摘下口罩才能参与公共生活。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欧美人对口罩如此抵制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可能首先跟欧洲目前所面临的宗教、民族变化有关。受中东移民大量涌入的影响,法国、奥地利等国近年来纷纷推出《反蒙面法》,试图阻止中东移民在公开场合以着装强调他们的固有民族宗教认同,而眼下是否戴口罩却让这些政府面临了两难——从法理上说,如果议会允许议员在会议期间佩戴口罩,那么未来也就没有理由阻止议员戴面纱;议会允许戴,其他公开场合更无权阻止……所以这个口子让欧洲一些国家感觉很难撕开。早在1月末,奥地利政府就曾发文提醒公众,人们仍不能以防止感染为由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否则会因为违反《反蒙面法》而被罚。

不过,单纯以短期民族、宗教考量去理解,显然无法解释欧美普遍对口罩的反感。西方人对口罩的抵触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

历史：  
口罩曾是恐惧的标志

如果真的追溯起来,欧洲人不把口罩当作常规性防护措施的卫生观念,甚至恐惧口罩,的确有其历史渊源。

其实,欧洲人是口罩的最早发明者,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口罩的雏形。当时,黑死病肆虐欧洲,一些欧洲医生发明了鸟嘴面罩,其前端的鸟嘴状构造装有丁香、龙涎香、玫瑰花瓣、樟脑等芳香物质,用来掩盖环境臭味及隔离病人的飞沫,并具有杀菌功能。

但问题在于,这种原始口罩的功效其实微乎其微,加上当时黑死病的超高死亡率,久而久之,人们就将鸟嘴面罩跟死亡联系了起来,加上当时的医生还喜欢用放血、鞭打等不科学的疗法

欧美人为何不愿戴口罩

出门要不要戴口罩?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当下,这个问题拷问着全世界人,但对于该问题,东西方人交出的答卷不太一样。在中国,不戴口罩你可能连小区门都出不了,但在欧洲,即便疫情已经出现规模性暴发的趋势,戴口罩仍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异类。西方人为什么不爱戴口罩?其实,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防疫问题,而是涉及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给病人“驱邪”,给人的恐怖感更甚。直到今天,“鸟嘴医生”的形象仍是不少欧美恐怖片中的标配,一出场就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基于文化心理的恐怖感。

也正因如此,在近代以后,医生们为了显示自己与“鸟嘴医生”的区别,很长时间内反而不再戴口罩,直到1896年前后,德国医生莱德奇通过观察做手术的患者伤口感染,进而推断出人们说话时飞溅的唾沫会使伤口恶化,才重新发明了医用口罩。但莱德奇的这一说法引起了同行的极大反感,很多人认为莱德奇这是在指责医生杀人,莱德奇和其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医生们至少在外科手术中佩戴口罩。但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惯性和早期的口罩佩戴起来不方便也不舒适,口罩在当时的欧洲只局限于医疗领域。

口罩最初的设计理念也影响了欧洲人的理解:口罩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己不感染别人。在欧洲人心目中,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不需要戴口罩。

东方人更为熟悉的“预防性口罩”,反而是咱们中国人首创的。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肆虐时,华人医生伍连德将当时简陋的外科手术口罩改造成防护用品,要求中国医生、卫生人员佩戴以防止被鼠疫传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当时同样前往中国东北帮助治疗鼠疫的还有一位法国医生迈斯尼,他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流行病学家,但他却坚持“口罩仅是防止医生传染给病患”的思路,批评中国人的做法是对口罩的“滥用”,最终,迈斯尼不幸感染鼠疫身亡。

不过,当时同样在中国东北有大量活动的日本医生们很快在这种对比中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将伍氏口罩借鉴到了日本,让日本成为防护性口罩最早获得全国推广的国家。

口罩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蔓延期间,欧美各国强制民众戴口罩。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府联合一些组织刊登声明,告诉人们口罩对流感有99%的抵抗力。不过,即便疫情带来了巨大损失,戴口罩的要求在当时依然遭遇巨大的反对声,很多人认为这有悖于美国人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所以,疫情过后,欧美民众很快又淡忘了口罩。

文化：  
东方的内敛与西方的开放

从更深层次来说,在历史阴影与现实政治考量之外,欧美人对口罩的抵触心理也有其文化背景在作祟。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重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医疗水平也同步增进,再加上战后自由主义的风潮,这就导致了西方对于自身有着极度的“制度自信”和“健康自信”,这两种自信都会让其对口罩有抵触情绪。

从意大利议员达罗索的上述发言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自信有多么根深蒂固:达罗索必须首先承认自己“免疫力低下”,以此才能获得佩戴口罩的合理性。换言之,即便在他的理念中,免疫力正常的人恐怕也没必要戴口罩。

其实,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身体健康及其所散发出的力与美在西方被视为与道德相通的美德,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将生病视为一种“上帝的惩罚”,这些文化基因的相互作用,都让欧美人更容易将“体弱多病”视为一种羞耻。

与之相对应,由于亚洲文化相对欧美文化更加内敛,口罩非但不会暗示自身体弱多病,反而会附加上不少积极意义:在日本,口罩不仅是一种防疫工具,还具有社交属性。日本秀明大学教授堀井光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认为日本人戴口罩主要是“相互客气”。在中国,由于曾先后经历过SARS和新冠肺炎两场疫情,在抗疫期间戴口罩被认为具有“响应国家号召”的集体主义象征。这些心态都与欧美迥异。

另外,由于劳动保障体系和生活观念的差别,欧美人在感到身体不适时更容易选择请假不上班,欧洲各国目前出台的防疫政策中,也更愿意强调“若身体不适请在家休息”,而不是“戴口罩出门”。

总而言之,不管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历史背景还是文化因素,欧美各国民众对口罩的偏见和抵制恐怕短时间内都难以打破。除非这些国家的官方医疗机构能够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数据,或此次疫情泛滥到如“西班牙流感”般严重的程度——但矛盾的是,如果事态真的恶化到那一天,将酿成一场全球大灾难,这样的代价无疑太过惨痛了。